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回望百年

谢冕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回 望 百 年

谢 冕

著

藏 书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望百年/谢冕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 - 7 - 5063 - 4525 - 5

I. 回… II. 谢…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②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323 号

回望百年

作者: 谢 冕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27 千

印张: 15.25

插页: 3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25 - 5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谢冕

1932年1月6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曾用笔名谢鱼梁。1945~1949年在福州三一中学就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长期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194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在《中央日报》、《星岛日报》、《福建时报》等报刊发表诗和散文等。著有学术专著《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大转型——后新时期研究》（合著）、《1898：百年忧患》等十余种，以及散文随笔集《世纪留言》、《永远的校园》、《流向远方的水》、《心中风景》等。主编过许多大型丛书，如《20世纪中国文学》（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卷）等。

曾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并兼任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主编。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三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目 录

千禧祝辞	
——代自序	1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集	4
近代文学浅识	
——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的发言	35
新文学一百年	41
中国新文学的宿命	61
从文学建设想到文化建设	75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艰难前进	80
一百年才有一次的聚会	
——记“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95
入海口向着源头的致敬	
——在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 2004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99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100
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 (1949—1999)	125
论中国当代文学	130
发展与变异	
——再论中国当代文学	155
文学曾经自由	165
文学的纪念 (1949—1999)	174
我们见证历史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和问题意识谈起	192



我们在秋风秋雨中度过的	
——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的讲演	202
《文学的中国城乡》序	213
城市书写的变迁	
——在深圳“中国城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216
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220
文学批评只是我人生一小部分	227
新世纪的祝福	
——代后记	235



千禧祝辞

——代自序

谢 冕

本世纪最后一次平安夜的颂歌唱过以后，这个给人类带来动荡又带来挑战的世纪就要庄严地落幕了。我们终于成为能够目睹新世纪辉煌日出的幸运者。记得一百年前的此时此刻，中国维新运动的先行者梁启超，经历了在日本一年多的流亡生活之后，正置身于由东方向着西方行驶的舟船之中。那时夜深人静，怒涛击打着船舷，海天无月，唯有几点寒星闪烁——“满船皆睡我彷徨，浊酒一斗神飞扬”——那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二十世纪的最初一个黎明，他在波浪滔天的太平洋上写下了跨越世纪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哲人此夜无眠。那时的中国，犹如梁启超此时乘坐的那一叶扁舟，正漂流于万顷怒涛之中，而茫然未卜其前程。

从那时开始到此刻为止，中国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在梁启超这种有点悲凉、也有点激昂的追索中走完了它的艰难的行程。从梁启超太平洋舟中放歌的那时开始，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出于强国新民的愿望，寻求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中国人为争取独立、和平、公理和正义的理想而进行的奋斗历程。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直至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完整的一百年间，中国文学为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力和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以惊人的坚持和韧性的抗争写下了本世纪惨痛的绚烂。

近代以来的这种文学运行，画出了文学获得自由、失去自由、最后又重返自由——追求、失落、再追求的鲜明的轨迹。中国文学就是





在这样类似圆圈的环行中并非重复地推展着。中国文学百年的进程，始终谋求文学与中国的社会改造以及国运宏兴这一目标的契合。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未曾有负于这一宏愿。它前进的每一步都传达着中国的忧患和中国的欢愉，百年的中国文学就是这样，成为中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奋斗的形象的缩影。启蒙和救亡、科学和民主、个性解放和民族振兴，这些命题都理所当然地融入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之中，从而成为它的传统主题。

但文学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长途上，始终面对着文学以外的异质的渗透和干扰。文学为维护自身的权力而历尽艰辛。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方才造就了我们如今面对的百年经典的辉煌。中国文学未曾与中国的社会兴衰和万家忧乐相脱节，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但文学的天空从来是浩瀚而丰盈的：外在世界辽阔而生动，内在世界隐秘而丰富。文学既面对着悠久的历史 and 复杂的社会，文学也面对着人世悲欢和人生忧戚。应当认为，所谓文学的功利性，既包括文学的教化作用，也包括消闲作用。文学既教育人，文学又抚慰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如今的这种看似平常的认知，确实经过几代人的抗争，付出血泪的代价方才获得的。

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艰难的行进中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以文学的世纪绝唱，记述了中国的百年沧桑。文学在施加影响于社会建设和改造民心的长途上，以智慧的心灵、精致的艺术、独创性的劳作，经历了曲折、痛苦而悲壮的抗争，维护了文学的庄严，造就了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经典。它写就了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险史。它又如万花筒那样地折射出中国社会悲喜交集的众生相。

岁月匆匆，冬去春来。劳燕一年一度地自北向南又自南向北地飞——生命就在这样的奔忙中延续着。而在这一百年间的中国文学，也是一代接着一代如蚕吐丝般地经历着黑暗又追逐着光明，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辉煌。那些辛勤劳作的人，有的已经离去，有的最终也将离去。而他们把优美的心灵化成了文字，它们成为历史的见证：几代人的憧憬，几代人的抗争，几代人的耕耘，几代人的收获，如今都凝结在这里了。

这是中国人在本世纪难忘的旅行中留下的并不轻松的记忆。它的

纹理之间，艳红的是血丝，晶莹的是泪水，它是几代中国良知的精神放逐和精神漫游的诗意历史。人间一切都短暂，唯有精神永远。亲爱的读者，在这千年一遇的世纪之交，当你们跨进这座神圣的艺术殿堂之时，你们和全人类都听到了世纪祝福的新年钟声。这是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灵魂在向你们祝福，也在向你们道别——它把未能预期的、但肯定是更加理性的和更加智慧的新的一千年留给你们去创造了。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珍重啊！

1999年12月31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集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本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上一个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反思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危机与动荡给予文学深刻的影响。它使我们经受着百年辉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个苦难历程的悲壮。中国百年文学是中国百年社会最亲密的儿子，文学就诞生在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

中国大地在这一百年中被它人民的血泪所浸泡。这血泪铸成的第一个精神产品便是文学。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简练的诗句传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他的亲爱土地的这种感觉：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
和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嘶哑的喉咙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以及在温



柔的黎明中的死去，这诗中充盈着泪水和死亡。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一百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这一年5月，出生在台湾地区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所说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一百年中国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由此出发的文学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坚定的观念和价值观。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这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超常的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

中国百年文学，或者说，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便是这种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有了这样的文学，中国的怒吼的声音、哀痛的心情，于是得到了尽情的表达，这是中国百年的大幸。这是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鲁迅对自己的创作做过类似的评价。他说他的《药》“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说他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说他的小说“近于左拉”，鲁迅分辩说：“那是不正确的，我的作品比较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起，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这人生”止，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快。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



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断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一处。这种集中于一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或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然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处境尴尬，更由此铸出了无穷无尽的纷争。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在酿造着一坛苦酒。于是，上述我们称之为的中国文学的大幸，就逐渐地演化为中国文学的大不幸。

近代以来危亡形势造出的中国文学，一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疗救社会的“药”而被不断地寻觅着和探索着。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紧紧相连的，他从群治的切入点充分估计小说在强国新民方面的作用。文学楔入人生、社会，希望成为药饵，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样，原本“无用”的文学，一下子变得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地“有用”起来。这种观念的形成，使文学作品成为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中国实际生活的欢乐与悲哀。文学不再是可有可无之物，也不再是小摆设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刀剑、一种血泪、一种与民众生死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物。

文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学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来，这种特殊性只是一种到达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的积极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

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在灰色云层空茫处，残留着上一个世纪末惨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门焚烟的余烬；那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残焰；那是1894年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沉船前最后一道光痕……诞生在这样大背景下的文学，旨在扑灭这种光的漫



延，的确是一种大痛苦和悲壮。但当这一切走向极端，这一切若是以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代价，那就会酿成文学的悲剧。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不缺乏这样悲剧的例子，这些悲剧的演出虽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轨迹可寻，大体而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 一、尊群体而斥个性；
- 二、重功利而轻审美；
- 三、扬理念而抑性情。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它极大地激活了文学创作。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学割裂的局面于是结束，两岸三边开始了互动式的殊途同归的整合。应该说，除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差别性减少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国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学，如今站在了同一个环境中来。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冲击，这些冲击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

摆脱了沉重负荷的文学，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它的狂欢的姿态，表现了一种对于忘记的遗忘，上一个世纪末的焦虑没有了，上一个世纪末那种对文学的期待，也淡远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抑制。这使人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化趋势产生新的疑虑。

一百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回望：一方面，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为文学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我们曾经自觉地让文学压上重负，我们也曾因这种重负而蒙受苦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文学的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悦。但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



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冀企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么？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園。

二

爆发在七十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时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亡才数年。那数年乃至以后的若干个数年，封建阴影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心的笼罩，依然深刻而浓重。正因为如此，处于方生未死之间，叛逆者的宣言和行动，益显孤独和悲凉。五四先驱者那一番愤世嫉俗的呐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旧文化、旧礼教、旧文学的断然决裂（至少是决裂的意愿），至今仍留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离开中国那一时期的特殊环境，来谈五四文化革命的意义都是非现实的。离开这一具体历史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体革命，用白话新诗代替古典诗词的诗体革命。打开《胡适文集》，他的那些为了新诗的尝试所付出的艰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步步为营的反抗和阻挠的结果。那一代人为了争取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诞生，其经历无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没有当日强烈而全面的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可能还是一个梦境。

至少是心理情绪上要求与旧传统的彻底决裂，于是才有了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的愿望及其有限度的实现：新文化由是开始发端；新文学由是开始生长；被严酷的封建秩序束缚、禁锢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由是开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一切均是初萌状态的，而且随后还受到无尽的折磨和抑制。显然，要是没有那个完整的和彻底反封建传统的抗争，为今日的发展所拥有的一切基础也许都不存在。

中国社会古旧的伦常礼教及其所铸成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积习所造成的危害，也许处于新旧交织的特殊时代的知识界最能痛切地感



受到。只要想想数十年后我们仍能感到封建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那一代先驱者的“粗暴”和“偏激”。这里是陈独秀致胡适书中的一段话：“改良文学之先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一卷第43页）

还有鲁迅关于“不读古书”的惊世骇俗的宣告。鲁迅把自己对旧文化的深入了解喻为曾经“纵酒”伤了肠胃。其实他的“戒酒”（至少劝人“戒酒”）的决裂与他的发现酒中有毒即发现书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有关。五四一代“多看外国书”以及引进西方观念的倡导，意在使中国人掐扎束缚吸取域外的新潮以改进思维习俗。陈独秀标榜的《新青年》的两大罪状，即拥护德先生和拥护赛先生，显然是以民主、科学的提倡以彻底反抗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伦理。

半个世纪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因为“文革”的文化命题只是发动暴乱的政治目的的借口。文化不是真正的起因，而文化灾难却是真实的结果。“文革”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均非革命意义上的。显然它所推进的现代迷信狂热，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对象的延展，它体现封建体系的整体特征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作为这一“革命”成果的精神废墟，正是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彻底背逆而不说明其他。

许多人受到了传统文明湮没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刺激，由此萌起振兴旧物的祈愿。这种沦落的苦痛完全可以理解。但“文革”的一切变异及罪恶决不是五四批判精神所能承担，更不是它所造成。“文革”给予人们的觉醒，若导向古旧传统的追恋，只能是悲剧的倒退。

个人崇拜导致神权的复活，人性的泯灭和沦落，一切仿佛都是封建主义的卷土重来，而使民主、科学精神荡涤无余。事实正是“文革”再度唤醒人们对于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因袭之顽强的警惕，使人们重燃反抗传统的意愿，这和当年的激烈反抗旧传统与认识到构成传统封建思想体系不可分。

中国缺乏的不是对传统的肯定和礼赞，恰恰是怀疑和批判精神。